大唐诗坛中

存世唐诗数量最多的诗人是谁?

全唐五代342年间,涌现出无数精彩的诗作,就如天上星辰闪耀在中国文学苍穹,组成一条瀚海的诗之银河。若要问这条银河中谁的星辰最多,那么白居易便会以2899首,在《唐五代诗全编》(以下简称《全编》)中占到惊人的5%而成为第一。

为何既不是"诗仙"李白也不是"诗圣"杜甫,偏偏是中唐白居易的作品能在存世唐诗数量上独占鳌头?

《白氏文集》的编撰流传

早在穆宗长庆四年(824),白居易曾经编成过《白氏长庆集》,这是白居易首次完整结集自家作品,随着时间流逝,诗文越攒越多,为了尽量完整保存自己诗文,他在此时又续编了好几次,结集为《白氏文集》,而将长庆年间编撰的文集称为"前集"。

据学者统计,白居易在洛阳隐居时,至少五次续编自己的文集。大和九年(835),64岁的白居易整理出一个60卷本的《白氏文集》,"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",后送到庐山东林寺收藏;开成元年(836),他又编成一个版本,"七帙六十五卷,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",送到洛阳圣善寺收藏;开成四年(839)年,他又做了一个本子,"七帙,合六十七卷,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",送往苏州南禅寺收藏;会昌二年(842),他为《白氏文集》编了二十卷《后集》,与长庆年间的《前集》合成70卷本,同样送到东林寺收藏;会昌五年,他在去世前夕搞完最后《续后集》,与前、后集合编为75卷本,是他最后编定的版本,比开成四年的67卷本多353首,"诗笔大小,三千八百四十首",因此也被他称为"大集"。

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,是因白居易见过前辈诗人李白诗句十不存一的惨况,不愿自己引以为傲的文字就此埋没,故而晚年汲汲于此。从结果来看,他煞费苦心的成果可以说既不成功也成功。说不成功是因为唐末五代的大战乱,他尽心安排的白氏家藏和三寺所藏文集原稿无一幸存;而说成功是因为他"狡兔三窟"的安排最终还是使后世能以补抄本存世,让他大部分诗作都保存了下来。

当然,想要诗文流传后世,光有自己结集、编辑还不成,最本质的依仗还是作品脍炙人口,能让人传颂千年,而白居易恰恰就是这样的大诗人。

一篇长恨有风情

白居易向来对自己的诗歌充满自信,元和十年(815)八月左右,白居易被贬为江州(今江西九江市)司马,给同样被贬为通州(今四川达州市)司马的元稹写了一通《与元九书》,既抒发心中块垒,又谈论些文艺。在信中,他告诉元稹,听说节度使高霞寓延请歌姬,没想到此歌姬说她会唱白学士(即白居易)讲唐明皇和杨贵妃的《长恨歌》,就此加价,高霞寓不得不多花一笔钱。

唐宪宗元和元年(806),34岁的白居易与当地进士陈鸿、隐士(一说仙游寺道士)王质夫共同游览境内终南山仙游寺,由于当地近马嵬坡,三人谈古论今不免说起前朝唐明皇与杨贵妃故事,均觉得是一桩"希代之事"。

在陈鸿的倡议下,决定由"深于诗"的白居易负责创作一首长诗。他虽用120句共840字的七言长篇完完整整地讲述了从贵妃入宫、马嵬惊变、回銮思人到海外寻仙,但略一考察就能发现诗较传略去或改写了不少史实,譬如开头白居易讲述杨玉环入宫是"杨家有女初长成""一朝选在君王侧",完全让人看不出李、杨二人原为翁媳的极度尴尬,算是为尊者讳;而在马嵬惊变中,他又着力刻画李隆基的无奈,似乎是被乱兵哗变逼死爱妃,对玄宗下令赐死杨玉环只字不提;后来李隆基回銮亲信被流放,成为大内的孤家寡人,白居易却只强调明皇痛失爱侣的孤单。

但大名鼎鼎的《长恨歌》在流传史上并没有永远收获掌声,至少不符合许多宋代评论家的理论框架,对其批评异常多,他们或硬用诗歌对标历史,说此诗中历史细节错误,乃是白居易"书生之见可笑耳";或觉得白居易在其中没有阐发封建道德大义,"造语蠢拙,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礼"。

但这种评价恰恰证明他们完全不懂白居易的妙处。没错,白居易在诗中淡化了历史,忽视了主角政治责任,但这么一来就让诗中感情线凸显。读此诗,谁又不被诗中男女主角的爱情所打动呢?通篇读下来,人们犹如看到一部讲述"希代之事"的爱情传奇,剧情曲折又荡气回肠,让人久久不能释怀。

事实也是如此,尽管不少古代评论家给予此诗差评,但它一问世就得到大众欢迎,李、杨爱情故事就成为经久不衰的故事主题,戏曲、诗歌纷纷汲取白居易创作灵感,推出新作,到明末还有吴伟业亦步亦趋地写了一首《圆圆曲》,可见时人和后人对其喜爱。

白居易何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,写下感情如此真挚的《长恨歌》?从他的诗歌中,旁人似乎发现一些端倪:白居易在老家符离(今安徽宿州市境内)曾有一名为"湘灵"的恋人,但贞元二十年(804)因"徙家秦中"而不得不分手,对此刻的他来说,或许这位"湘灵"姑娘就如"山在虚无缥缈间"的仙子,只有期待"天上人间会相见"吧。

十篇秦吟近正声

在《与元九书》中,白居易与好友详细地交流自己创作经验,将自己诗歌分为四类,分别是"知足保和,吟玩情性"的闲适诗;"诱于一时一物,发于一笑一吟"随笔的杂律诗;以及"事物牵于外,情理动于内"的感伤诗——脍炙人口的《长恨歌》就被他归于感伤诗。不过在此三种之外,白居易更为看重,或者说最让他自己引以为傲的还是"所遇所感,关于美刺兴比者"的讽喻诗,即他所言"自武德讫元和,因事立题,题为《新乐府》者,共一百五十首,谓之讽喻诗"。由于白居易的《新乐府》不仅突破了乐府旧有题目,更是乐府辞不再入乐彻底独立的标志,因为后世将他讽喻诗所引领的诗文风尚称为"新乐府运动"。

白居易的新乐府系列不仅讽刺前朝和泛泛而谈现象,更会"因事立题"地针对当下,譬如《宿紫阁山北村》,全诗毫无遮掩地描绘一群士兵冲入普通百姓家,吃喝不说还砍走主人家三十年奇树,然而"主人退后立,敛手反如宾",原因就在于这伙强盗"身属神策军"。言及此,熟悉中唐政治的人都已了然,但白居易偏偏还要点出要害"中尉正承恩"——神策军是中晚唐时的禁军,其统帅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向来由宦官担任,以此控制朝政乃至拥立皇帝,兴风作浪不可一世,诗人点出此,直接将矛头对准宦官,不可不谓大胆。

白居易讽喻诗战斗力极强。翻开他的文集,打头4卷全是有类于此朗朗上口而又批判意义十足的诗歌,唐宪宗迷信金丹,他就写《海漫漫》"戒求仙也";兴后宫,他就写《上阳白发》"愍怨旷"……件件桩桩都戳在朝廷的肺管子上,让当政者如鲠在喉。

白居易为何如此火力全开?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言"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",他此时创作的大量讽喻诗,就是凭借着一腔热血想要对改变朝廷弊政有所贡献。

《琵琶引》背后的落寞

元和六年(811),白居易因母亲去世不得不在下邽紫兰村(今陕西渭南市经开区境内)守丧三年,等元和九年(814)回任后,朝廷授左赞善大夫,成为太子属官。就在次年,长安爆发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,宰相武元衡遭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勾结宦官暗杀。

堂堂宰相遭人当街刺杀,可谓有唐以来政坛奇闻。白居易对其尤为不满,他觉得此事是国家奇耻大辱,不仅上疏奏请追查刺客,还在给亲朋信中痛斥满朝权贵。

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白居易如今是太子属官,不应该在谏官未上章之前大发议论,是为僭越——真实原因还是他当年当谏官的时候得罪人太多。又有人开始拿白居易家庭变故说事,私下传播说白居易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,白居易自己又写赏花和新井的诗歌,孝道有亏,怎能留在太子身边?必要赶出朝廷,最后由中书舍人王涯出面参奏,于元和十年八月将白居易贬为江州(今江西九江市)司马。

从京城贬黜地方,从清要京官变为地方闲差,已是挫折,但更让白居易寒心的可能是朝中政敌下作手段。白居易母亲长年患精神方面疾病,去世原因也众说纷纭,但一向是白氏诸兄弟的隐痛,而衮衮诸公居然翻出此等隐私和伤痛,实在让他难以承受。有道是"文章憎命达",抱着满肚子伤感的白居易在江州给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与《长恨歌》相俦的名篇——《琵琶引》(《琵琶行》)。

后人自然可以嘲笑白居易一经挫折便心志消磨,但更需要理解他所处的环境。一方面元和十年贬谪对他的精神打击相当之大,另一方面朝廷也不同往昔。从宪宗算起、连续三任(宪、穆、敬)皇帝都死得不明不白,宦官拥立弑杀皇帝如儿戏,藩镇叛服不常。昔日元和中兴时,他还是热血谏官,能有心气以诗歌讽刺朝政,但随着短暂中兴戛然而止,唐王朝国运江河日下,而他自己也多经变故,少有心气和热情写那些战斗诗篇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白居易已经逐渐变成昔日他曾看不上的、默默无言独善其身的官僚。

从结果看,被讥讽为"俗"的白居易诗文其实得风气之先,风靡天下,"童子长吟长恨曲,胡儿能唱琵琶篇"就证明他在文学上的成功。与此相应,由于白氏诗文广受欢迎,人们当然乐于传唱继承,尽量将其保存下去。千百年之后,就连东瀛海外也能保存一份资源,供后人校补,白居易传世诗歌数量成为唐诗第一,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本报综合消息

"元旦"两字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姗姗来迟

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的"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",可谓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。不过,王安石笔下的"元日"并非现在的"元旦",而是农历正月初一。

闲翻史籍发现,汉武帝之前的"正月"并未固定。《史记·八书·历书》云:"夏正以正月,殷正以十二月,周正以十一月。盖三王之正若循环,穷则反本。"秦始皇更霸道,直接将正月提前至农历十月,《史记·十二本纪·秦始皇本纪》曰:"改年始,朝贺皆自十月朔。"汉武帝坐稳大位后"拨乱反正",于公元前104年启用《太初历》,将"正月"改回"农历一月",《史记·十二本纪·孝武本纪》谓:"汉改历,以正月为岁首,而色上黄,官名更印章以五字,因为太初元年。"一直沿至清朝末年。不过,两汉时期,农历正月初一往往称"岁旦"或"正旦"等。

"元旦"两字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姗姗来迟。《晋书·志·第七章》曰:"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,其时正月朔旦立春。""元"谓"始",凡数之始称为"元";"旦"谓"日","元旦"意为"初始之日"。南梁史学家、文学家萧子云《介雅》诗云:"四气新元旦,万寿初今朝……日升等皇运,洪基邈且遥。"

"元旦"一词首次现于文学作品后,引来文人墨客纷纷仿效,唐代诗人孟浩然于开元十五年(727年)阴历正月初一写的"昨夜斗北回,今朝岁起东……田家占气候,共说此年丰",宛如一幅田园牧歌图,抒发作者新年元旦时的心绪;永贞元年(805年),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,他在任上度过"身加一日长,心觉去年非……异乡无旧识,车马到门稀"的"元旦"。

相比刘禹锡的朗州元旦,宋代词人毛滂的"一年滴尽莲花漏,碧井酴酥沉冻酒……醉乡深处少相知,只与东君偏故旧",构思新颖,他被早春的物候所惊,犹如见到久别重逢的故旧。南宋吴自牧史料笔记《梦粱录》开篇就郑重其事地注释"元旦":"正月朔日,谓之元旦,俗称为新年。一岁节序,此为之首。"

十四世纪西方"文艺复兴"至十六世纪达到巅峰,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的"黄金时期",而明清时期的我国科学技术相对停滞,历法已落后于西洋历法,使用已久的《大统历》误差越来越多,导致钦天监测算日食接连失误。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发现依据西方历法测算日食差错率小,便提出改历。清朝建立后,参与徐光启主编《崇祯历书》的德国人汤若望将之呈给清廷,新历定名《时宪历》,于顺治二年(1645年)颁行天下而成为官方历法。

民国时期,临时政府在服饰、称谓、历法诸方面都努力与"国际接轨"。1912年1月2日,临时政府发布《改历改元通电》:"中华民国改用阳历,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,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。"临时政府强力推行新历法时,考虑民众生活需要和情感诉求,新历下还附旧历。自此以后,阳历新年称"元旦",农历新年称"春节"。看到"元旦"冷冷清清,"春节"热闹异常,临时政府强行取消春节,南京国民政府也曾颁布命令,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,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公历、废除农历,但效果甚微。

新中国成立伊始,1949年9月27日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: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,本年为1949年。不过,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,新中国也一直沿用传统农历推算春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等。农历并非"阴历",而是在夏历的基础上融合阳历的一种"阴阳合历",取月相的变化周期,加入干支历"二十四节气",参考太阳回归年为年的长度,通过设置闰月以使平均历年与回归年相适应。可以说,在新中国民众才欣然接受"元旦"为公历新年。

本报综合消息